

拉施特与汉学

王 一 丹

拉施特（拉施都丁）·法兹鲁拉·哈马丹尼（Rashīd al-Dīn Faḡl Allāh Hamadānī , 1247~1318）是伊朗伊利汗王朝（Il-khan Dynasty, 1256~1353）杰出的政治家和史学家。除了人们熟悉的历史巨著《史集》（*Jāmi' al-Tawārīkh*）以外，他还有大量其他著述传世，其中不少与汉学有关，涉及中国的医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园艺和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由于写作时得到了旅居波斯的中国学者的帮助，他直接利用了第一手的汉文材料，所以他的汉学著作不同于许多当时通行的、以传闻为依据而写成的阿拉伯-波斯历史地理著作，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拉施特与汉学有关的著述主要有《史集·中国史》、《关于中国科学技术的伊利汗珍宝之书》、《迹象与复苏》等。在从事文字著述的同时，拉施特还引入、传播中国文化，如延请中国医生到波斯、培养波斯人学汉语，等等。本文试图从汉学的角度，介绍拉施特作为西亚地区最早的一位汉学家所取得的成就。

一、拉施特与汉学有关的文化活动

1. 推广中国的医学

拉施特出身于医学世家，从伊利汗国的阿八哈汗（1265~1282 在位）时起，就开始担任宫廷御医，声望颇高。后来，他在经世治国方面的才能逐渐得到施展，历任合赞汗（1295~1304 在位）、完者都（1304~1316 在位）两朝宰相，直至不赛因（1317~1335 在位）执政初年，任宰相职共 19 年，权势隆盛。任宰相期间，拉施特辅助伊利汗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政绩显著。在繁冗的政务之余，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财富，积极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在伊利汗国首都帖必力思（Tabriz, 今译大不里士）附近，他出资兴建了一座名叫“拉施特镇”（Rab'-'i Rashīdī）的小城，在那里建造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设施以及相关机构，如公共学堂、图书馆、医院、药店、制药厂、药浆坊、天文台、造

纸厂、抄书房，等等。^① 因此，拉施特镇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

由于拉施特是御医出身，他对医学事业格外关注。在拉施特镇设立的医院不仅是治病救人的机构，还是医学教育的中心，同时也是学医者临床学习的重要场所。医院里不仅有波斯医生，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医生，其中包括中国医生。拉施特本人在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谈到：“有 50 名高明的医生，来自忻都（印度，Hind）、秦（中国，Chīn）、密昔儿（埃及，Misr）、苦国（叙利亚，Shām）和其他国度，都在此受到隆重礼遇，他们每天在医院中巡视，每人身边配备两名出众的学生，向他们学习这门崇高的技艺。”^②

推行外国的医学，必需使用外国的药材，拉施特镇医院有专门的制药厂生产药品，同时也直接从国外输入药材。拉施特在另一封信中特别谈到从中国进口药浆之事：“从秦（中国）运来了一千罐药浆，制作极其精良，罐上注明药浆的名称，并被冠以鄙人之名。盛放糖浆的盒子也是在秦制作后运来。”^③

除了聘请中医、进口中药，拉施特还组织人力翻译中医典籍，下文将谈到的王叔和的脉学著作即在此时译成波斯文。从拉施特大力推广中医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医学在拉施特时期显然是作为一门先进的科学受到波斯人重视和欢迎的。

中国与波斯的医药交流历史悠久，在唐代时已相当活跃，蒙元时期与以前相比又有了更大发展，不但伊利汗宫廷中有中国的医师、药品和医书，波斯人及其医药在元代中国医药界也同样发挥着引人注目的作用。成书于 14 世纪下半叶的汉文伊斯兰医药典籍《回回药方》中有大量的波斯文药名及波斯文标注，其“字里行间充满了波斯文化之痕迹”，表明“《回回药方》的编撰者有波斯人”。^④

拉施特作品中大量与中国医学有关的记述，与《回回药方》一样，正是反映蒙元时期中国与波斯医学之间巨大的互相影响的重要文献。

2. 培养波斯人学习汉语

拉施特镇图书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收藏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图书，另一部分收藏包括中文在内的外文图书。其具体藏书情况是：“共有 6 万册图书，内容涉及各门学科，以及历史、诗歌、故事集等等，从伊朗、土兰（Tūrān）、密昔儿、马格里布(Maghrib)、罗

① Rashīd al-Dīn, *Mukātibāt-i Rashīdī* (《拉施特书信集》), ed. M. Shafī', Intishārāt-i Dānishgāh-i Panjāb, Lahore 1947, pp.236~319; id., *Vaqfnāma-i Rab'-i Rashīdī* (《拉施特镇捐赠书》), Intishārāt-i Anjuman-i Āsār-i Millī, Tehran 1971, pp.169,179,183,188~189,293,325; id., *Tārīkh-i Mubārak-i Ghāzānī* (《合赞汗吉祥史》), ed. Karl Jahn, London 1940, pp.210, 214.

② Rashīd al-Dīn, *Savānīh al-Afkār-i Rashīdī* (《拉施特信札》), ed. M.Dānishpizhūh, Intishārāt-i Kitābkhāna-i Markazī-i Dānishgāh-i Tehran, Tehran 1979, p. 290; 又见 *Mukātibāt-i Rashīdī* (《拉施特书信集》), p.319.

③ *Mukātibāt-i Rashīdī* (《拉施特书信集》), p. 237.

④ 宋岷：《回回药方考释》，中华书局，2000，“前言”，30 页；同作者：《古代波斯医学与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97~98 页。

姆(Rūm)、秦和忻都等地收集而来,我把它全部捐赠给了拉施特镇图书馆。”^①

收藏外文书籍,表明这里应该有能够阅读和利用这些书籍的学者,他们可能是伊朗人,也可能是外国人。伊利汗王朝时波斯有来自印度、欧洲、中国等地的学者,其中中国学者不在少数,这一点在下文谈及《史集·中国史》时将详细介绍。这里先谈谈拉施特培养伊朗人学汉语的情况。

从拉施特存世的著作来看,在所有外国语言中,汉语显然最受他的重视。这是因为他认识到,伊朗人对其西方如希腊、罗马,东方如印度等民族的文化接触较多,对这些国家的经典著作进行翻译介绍也较多,而中国(“乞台、秦和摩秦”)的汉语文献却几乎从未传入过波斯,即使偶有传入,也没有人进行翻译或利用,对于伊朗人来说,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因为中国作为当时世界的强国,其科学技术和文化必定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伊朗人无法利用汉语文献,也就等于失去了向这个发达的文明学习和借鉴的机会。因此,他从当时受过教育的伊朗人当中,选出了一位“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对各门学科均有所涉猎、尤其通晓医学和哲学”的名叫萨菲·都拉·阿丁(*Ṣafī al-Daula va al-Dīn*)的年轻人,让他跟随一位当时寓居伊朗、名为 *Siusa*(?)的中国学者学习汉语、汉字和中医,同时还给他专门配备了一个既懂汉语、又懂波斯语的翻译(“译人”),这个译人是伊朗人,“其父乃医生,早年前往中国,译人即出生于中国,他向父亲学得波斯语,又向中国人学得汉语,兼通两国诗文,颇有才艺。”^②既有中国老师,又有伊朗翻译,加上本人的天赋,萨菲·都拉·阿丁学好汉语应该毫无问题。像这样通晓汉语的波斯译人对翻译汉文典籍、帮助拉施特撰写有关汉学的著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拉施特与汉学有关的著作

1. 《史集·中国史》(*Tārīkh-i Chīn az Jāmi‘ al-Tawārīkh*)

《史集》是拉施特最著名的著作。自从1836年法国学者卡特麦尔(M. Quatremère)刊布了有关《史集·旭烈兀汗传》的研究著作以来,经贝勒津、伯劳舍、波伊勒、卡尔·雅恩等世界各国学者不断深入研究,《史集》作为研究蒙古-突厥史的重要文献的价值已为人们所熟悉,拉施特也因此而成为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

《史集》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历史巨著,除了“蒙古史”以外,它还包括一个被称为“世界史”的部分,记述印度、富浪(*Farang*)、中国、以色列等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因此,《史集》被誉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通史。^③其中“中国史”是根据一部现已

① *Mukātībāt-i Rashīdī* (《拉施特书信集》), p.237; *Savānīh al-Afkār-i Rashīdī* (《拉施特信札》), p.214.

② *Rashīd al-Dīn, Tankhūnāma yā Ṭibb-i Ahl-i Khatā* (《檀香纳梅或中国医学》) ed. M. Minuvī, Intishārāt-i Dānishkada-i Adabiyāt va ‘Ulūm-i Insānī-i Dānishgāh-i Tehran, 1971, pp.23~24, 31.

③ Karl Jahn, “Rashīd al-Dīn as a World Historian”, *Yādnāme-ye Jan Rypka*, Prague 1967, pp.79~87; J.A. Boyle, “Rashīd al-Dīn, the First World Historian”, *Iran* 9, 1971, pp.19~21, 26.

失传的汉文史书于 1304 年翻译编写而成,记述了古代中国上起盘古、下迄宋代(包括辽、金)共 36 个王朝的历史和 267 个帝王的世系,并保存了从汉文史书中描摹下来的历代帝王的画像。在“中国史”的前言中,拉施特还介绍了寓居波斯的中国学者的文化活动,着重对中国的汉字、历法、印刷术以及官修史书的传统进行了评述,体现了当时西域学者在汉学方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史集·中国史》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由西域学者编写的中国通史,不但对了解中国与波斯的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汉学研究也有它的弥足珍贵的价值。《史集·中国史》“是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一束奇花”,它“是一部罕见的奇书,它反映出随着蒙古世界帝国的建立,中国的文化向西传播的真实面貌,尽管《中国史》中提到的中国帝王名称和其在位历史纪年存在某些错误,但却深刻反映出元代波斯、西域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了解到何等深刻的程度”,它所记载的契丹(辽)和宋朝的历史,“其成书时间比脱脱主持在元朝本土编成的《辽史》、《宋史》还要早。”^①

在拉施特之前,许多波斯、阿拉伯历史学家都撰写过关于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历史的通史性著作,如叶耳孤比(Ibn Wāzih al-Ya'qūbī, 卒于 897 年)的《叶耳孤比史》(*Ta'rikh al-Ya'qūbī*)、泰伯里(Muhammad Ibn Jarir Tabarī, 838~923)的《历代先知和帝王史》(*Ta'rikh al-Rusul w-al-Mulūk*)、麦斯欧迪(al-Mas'ūdī, 卒于 957 年)的《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Murūj al-Dhahab wa-Ma'ādin al-Jawhar*)、伊本·艾西尔(Ibn Athīr, 1160~1234)的《历史大全》(*al-Kāmil fī al-Ta'rikh*)等,这些历史著作都用单独的篇章介绍了中国历史。但是,它们讲述中国历史时,无一例外地按照波斯或伊斯兰的写史传统,把中国历史的起源纳入波斯神话或《古兰经》传说体系之中。例如,叶耳孤比称中国人的始祖是《古兰经》传说中的先知努哈的第五世孙,他率领族人乘船来到东方,择地而居,并把这片新土地称为“秦”(中国)。^②泰伯里则在其史书中承袭波斯写史传统,将中国人的祖先追溯到波斯神话传说中的国王法里东。^③除了历史著作以外,9~10 世纪以后的伊斯兰世界还出现了大批地理著作,它们关于中国的记载大多取材于商人、旅行家的见闻,其中记载的中国风俗人情、商贸活动和道路行程等都有重要价值,但在谈及中国历史的时候都同样难免附会之嫌。总之,由于历史条件和知识水平的限制,13 世纪以前的穆斯林历史地理学家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记述都缺乏翔实可靠的史料依据,因此所记内容往往出于臆测,流于荒诞。

13 世纪后,随着蒙古人的西征和地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的建立,东西方之间的联系

① 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80~183 页。

② Ibn Wāzih al-Ya'qūbī, *Ta'rikh al-Ya'qūbī* (《叶耳孤比史》), Beirut, pp. 180~184. 参见《叶耳孤比史》的波斯文译本: *Tārīkh-i Ya'qūbī*, trans. M.E. Āyatī, Bungāh-i Tarjuma wa Nashr-i Kitāb, Tehran 1968, vol. 1, pp. 221~227.

③ Muhammad Ibn Jarir al-Tabarī, *Ta'rikh al-Umam w-al-Mulūk* (《诸民族与帝王史》,即《历代先知与帝王史》), Cairo 1939, pp. 147~149. 参见《泰伯里史》波斯文译本: *Tārīkh-i Bal'amī*, ed. M.T. Bahār, Kitābfurūshī-i Zuvvār, Tehran 1974, vol. 1, pp. 147~150. 在波斯古代神话传说中,大地之王法里东将天下分封给其三个儿子,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大地为其次子图尔所得。

空前密切,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拉施特编写《史集》时,波斯伊利汗宫廷中汇集了来自“中国、印度、畏兀儿、钦察等民族的学者贤人”。^①各方学者会聚一堂,为《史集》中“世界史”部分的完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当时的各汗国之间,伊利汗国同元朝政府的关系又远比同其他汗国之间的关系密切。旭列兀的后代在承袭伊利汗称号时,需经元政府册封,元朝派往波斯的使节常年不断,《史集》中常常提到的李罗丞相便是元政府派到伊利汗国的使者,他“通晓各种技艺,熟悉突厥诸部落起源及其历史,尤其是蒙古史”,拉施特编写《史集》的“蒙古史”部分时,时常向他请教。^②

拉施特撰写史书时遵循一套非常谨慎和科学的方法:首先,尽量直接利用第一手材料;其次,利用熟悉历史的对象国学者的帮助;第三,利用通晓对象国语言文化的本国学者(或译人)当翻译。我们知道,拉施特在编写《史集·蒙古史》时,除了利用已有的波斯文历史著作外,还利用了两部关于成吉思汗及其祖先和后代的重要原始文献——官方史书《金册》(Altan Daftar)和《蒙古秘史》;同时,他得到了通晓蒙古史的李罗丞相的帮助。同样,在编写印度史时,他利用了来自印度的文献,并得到了一位喀什米尔僧侣的帮助。很自然,在编写中国史时,拉施特采取了同样严谨的方法,他直接利用了一部汉文史书,并得到了两名中国学者的帮助。他在《史集·中国史》前言中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

(合赞汗)下令,对该国(Khatāy, 乞台)的史书删繁就简,编成一部简史。根据他无远弗届的威严命令,两位名叫 Lbbahi 和 mksun 的乞台学者提供了帮助。他们通晓乞台的天文、历史和医学,从乞台带来一些有关的图书。他们知道君王的命令后,献出带来的史书,讲述道:…乞台人的历史非常古老和久远,不过,如今乞台人中流传着一部著名的史书,该书详细记载历代帝王的名号及各朝史实,记事准确可信,颇得乞台贤人学者的推许。该书作者为 3 名受人尊重的贤士,一个名叫 Qūiyyn 和尚, Qūiyyn 是名,“和尚”为号,即大师(Bakhshī, “博士”)之意,他是 Tāy ‘Ān Jūy(泰安州?)人;另一位名叫 Fnjū 和尚,是 Fīnjū(汾州?)人;还有一位名叫 Shīkhūn 和尚,是 Lāukīn(洛京)人……(他们)生活在一位名叫陈留王(Chin Līvān)的君主当政之时,从那时到现在——即伊斯兰历 704 年——已经过去了[1044]年,至于该君王的详情下文将谈及。^③

由于波斯语无法准确转写汉语的发音,加上《史集·中国史》的不同抄本在抄写过程中发生的讹误和字母脱落,因此,在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汉文史料之前,无法准确写出

①② 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均、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1卷第1分册,116页。

③ Rashīd al-Dīn, *Tārīkh-i Chīn az Jāmi‘al-Tawārīkh* (《史集·中国史》), ed. Wang Yidan, Iran University Press, Tehran 2000, pp.86~90; 参见 Karl Jahn, *Die Chinageschichte des Rasīd ad-Dīn*,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Wien 1971, pp. 23~26.

引文中提到的这些中国人的名字。^①至于拉施特所说的《史集·中国史》所依据的汉文史书,德国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认为它是一部佛教史著作。他指出,拉施特的中国史与元代僧人念常所撰《佛祖历代通载》(约完成于1341—1342年)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很可能他们所依据的史书同出一源。^②

当时寓居于波斯的中国人士,除了这两位协助编写“中国史”的学者以及上文提及的教萨菲·都拉·阿丁学汉语的 Siusa 以外,还有一位天文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国史》前言中谈到,旭列兀汗(1258—1265在位)统治时期,著名的波斯数学家、天文学家纳西鲁丁·图西(Naṣīr al-Dīn Tūsī, 1200—1273)奉命撰写《伊利汗历书》(Zīj-i Ilkhānī),旭列兀汗诏令一位名叫 Qūmīhī、被人们尊称为“先生”的中国学者协助他进行这项工作,两位学者互相交流和传授知识,因此《伊利汗历书》中包含了一些中国的天文历法常识。^③

2. 《关于中国科学技术的伊利汗珍宝之书》(Tanksūqnāma-i Īl-khān dar Funūn-i 'Ulūm-i Khatāyī)

这是拉施特关于汉学的另一部重要著作。Tanksūqnāma 意为“珍宝之书”,伊利汗国时期波斯有两部以 Tanksūqnāma 闻名的作品,一部是纳西鲁丁·图西的矿物学著作《伊利汗的珍宝之书》,^④另一部即拉施特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的伊利汗珍宝之书》。

像编写史书一样,写作此书时,拉施特也充分利用了汉文典籍和中国学者,以及通晓汉语的伊朗翻译。上文提到的萨菲·都拉·阿丁就是拉施特为了编纂此书而特意培养的“译人”。该书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中国的传统医学、植物学(“本草”),以及中国的典章礼仪。拉施特在该书前言中谈到了中国的文字、印刷术、钞、乐谱等内容。根据他在该书前言中的编写计划,全书分为4卷:

第1卷介绍中国的脉学,其内容主要出自我国晋代名医王叔和(265~317)关于脉学的著作《脉经》^⑤或《脉诀》^⑥。

① 给拉施特提供帮助的上述两位乞台学者的名字在不同的《史集·中国史》抄本中有不同写法,参见 É. Quatremère, *Histoire des Mongols de la Perse*, Amsterdam 1968, LXXVIII; E. Blochet,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s Mongols de Fadl Allah Rashid ed-Din*, Leyden-London 1910 (GMS, XII), pp. 98, 100-101;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London 1958, vol. 1, p. 45.

② Herbert Franke, "Some Sinological Remarks on Rāšid ad-Dīn's History of China", *Oriens* 4, Leiden 1951, pp. 21~26; Karl H. Menges, "Rāšidu-'d-Dīn o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5/1 (1975), pp. 95~96.

③ *Tārīkh-i Chīn az Jāmi'al-Tawārīkh* (《史集·中国史》), pp. 83~84. 这位中国“先生”的名字在不同抄本中有不同写法,参见 *Die Chinageschichte des Rāšid ad-Dīn*, pp. 21~22.

④ Naṣīr al-Dīn Tūsī, *Tanksūqnāma-i Ilkhānī*, ed. M. Rāzavī, Intishārāt-i Bunīyād-i Farhang-i Iran, Tehran 1969.

⑤ 转引自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vol. 1, pp. 218~219;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第1卷,488、490~491、653页。

⑥ 岳家明:“中国医学在伊朗”,《中华医史杂志》,1984年第14卷第1期,28~29页; A. Dragunov, "A Persian Transcription of Ancient Mandarin", *Bulletin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l'URSS (Classe des sciences sociales)*, IX (1931): 359-375. 此据 O. I. Zavyalova, "Sino-Islamic Language Contacts along the Great Silk Road: Chinese Texts Written in Arabic Script", 《汉学研究》(1999), 第17卷第1期, 290页。

第2卷介绍中医的针灸学,包括人体的经络、血象等。

第3卷介绍中医的药物学,其中又分本草和方剂等部分。

第4卷介绍中国人的典章礼仪。拉施特把医学与典章制度合写于一书,因为他认为前者能赐人以身体的健康,后者能带来社会的安宁,身体健康与社会安宁乃是构成人类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两个因素。

此书第2、3、4卷都已失传,只有第1卷存世,1971年伊朗德黑兰大学出版了该卷的影印本,取名为《檀素纳梅或中国医学》(*Tanksūqnāma yā Tibb-i Ahl-i Khatā*)。^①

3. 《迹象与复苏》(*Āthār va Ahyā*)

拉施特任宰相期间,为了恢复因战事而遭受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改善和发展伊朗的种植业,曾采取许多改革措施。拉施特在其书信集和其他作品中,常常谈到他对复兴农业的关注,他还从那些包括中国在内的物产丰富的国家输入树苗和种子,以改善伊朗的种植业。^②巴托尔德、彼特鲁舍夫斯基等人都曾指出过拉施特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③《迹象与复苏》就是一部关于农业和园艺的著作,其中谈到的中国植物有茶、檀香、肉桂(桂皮)、椰子、槟榔、松木、沉香、苏木、莲花、杨梅等20种,^④拉施特详细介绍了这些植物的外观、性状、用途和栽培方法,并用波斯语逐一记录了它们的汉语名称,由于传抄过程中的字母脱落和讹误,目前有些读音尚难释读和确认。

中国的植物传入伊朗,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8年张骞通西域时在大夏(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巴尔赫)见到的“邛竹杖”。^⑤当然,当时传过去的可能只是作为产品的“杖”而非作为植物的“邛竹”本身。对于传入伊朗的中国植物,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曾在《中国伊朗编》中进行过详尽研究和分析,他列举的植物有方竹、桃、杏、肉桂、莪术、姜、黄连、大黄、无患子、庵摩勒、蜀葵、中国玫瑰、芒果、檀香、桦树、茶、土茯苓等17种。^⑥《迹象与复苏》中的记载,显然可以大大丰富劳费尔的统计结果。

该书于1905年以《农事与耕作》之名在德黑兰出版了石印本,作者名称不详,只

① Rashīd al-Dīn, *Tanksūqnāma yā Tibb-i Ahl-i Khatā* (《檀素纳梅或中国医学》) ed. M. Mīnuvī, Intishārāt-i Dānishkada-i Adabiyāt va 'Ulūm-i Insānī-i Dānishgāh-i Tehran, 1971.

② Rashīd al-Dīn, *Āthār va Ahyā* (《迹象与复苏》), eds. M. Sutūda and I. Afshār, Tehran, Mc Gill University-Tehran University Press, 1989, "Muqadama", pp. sī-u yik- sī-u nuh.

③ W. W. Barthold, *Ābyārī dar Turkistān* (《突厥斯坦的灌溉》, 波斯文译本), trans. K. Kishāvarz, Intishārāt-i Dānishgāh-i Tehran, 1971, pp. 12~18; I. P. Petrushevsky, *Kishāvarzī va Munāsibāt-i Arzī dar Irān-i 'Ahd-i Mughūl* (《蒙古时期伊朗的农业和土地关系》, 波斯文译本), Intishārāt-i Dānishgāh-i Tehran, 1965, vol. 1, pp. 56~63, 92~121.

④ *Āthār va Ahyā*, pp. 70~103.

⑤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3166页。

⑥ B. Laufer, *Sino-Iranica*, Chicago 1919, pp. 535~571; 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364~407页。

是被称为“合赞汗时期的一位博学之士”。^①此后，德黑兰大学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合作，于1989年重新出版了该书，定名为《迹象与复苏》，并确认其作者为拉施特。^②

Rashīd al-Dīn's Contribution to Sinology

Wang Yidan

Rashīd al-Dīn Faḡl Allāh Hamadānī (1247~1318) is a well-known Persian historian in Il-khan Dynasty (1256~1353). Besides his famous magnum opus of historic significance *Jāmi 'al-Tawārīkh*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es), he has many other works on Sinology cover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China,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 Chinese horticulture and sciences, etc. When he was writing his works on Sinology, he was assisted by Chinese scholars living in Persia at that time, and made use of original Chinese books. Therefore his works about China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from other Arabic-Persian history-geographic works popular at that time.

Rashīd al-Dīn's main works on Sinology include the part of *History of China* in *Jāmi 'al-Tawārīkh*, *Tanksūqnāma* (The Book of Rare Treasures), *Āthār va Ahyā* (Signs and Resurgence). While he was engaged in writing books about China, he also tried to spread Chinese culture in Persia, such as inviting Chinese doctors to Persia, training the Persians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etc. The present article introduces Rashīd al-Dīn as the first Sinologist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presents his cultural activities from the Sinological point of view.

① 'Abd al-Ghaffār Najm al-Daula, *Majmū'a-i 'ulūm-i īrānī dar zirā'at va falāhat va bāghbānī va ghairihī mushtamil bar chahār kitāb. Kitāb-i avval dar 'ilm-i falāhat va zirā'at. Ta'lif-i shakhs-i 'ālim va 'āmil va sayyāhī dar 'ahd-i Ghāzānkhān*, Tehran 1905. 参见 Karl Jahn, "The still Missing Works of Rashīd al-Dī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9, 1964, p.118; A.Z.V. Toga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s by Rashīd al-Dī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7, 1962, p. 62.

② Rashīd al-Dīn, *Āthār va Ahyā* (《迹象与复苏》), eds. M. Sutūda and I.Afshār, Tehran, Mc Gill University-Tehran University Press, 19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三集)/叶奕良 编.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1
ISBN 7-301-06650-3

I. 伊… II. 叶… III. 伊朗-研究-文集 IV. K37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7248 号

书 名: 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三集)

著作责任者: 叶奕良 编

责任编辑: 胡双宝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650-3/G · 0911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34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82866441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7.25 印张 348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